

北魏前期文学嬗变探析

任江维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 北魏文学是整个北朝文学的核心组分, 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特点是凋敝萧条, 主要在于武治文明对文学的削弱, 严酷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及鲜卑化对汉化的排斥, 这是造成北魏前期文学凋敝萧条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北魏文学; 北朝文学; 凋敝萧条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94047- (2015) 02-058-03

从鲜卑拓跋氏进军中原到孝文帝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可以归结为北魏文学凋敝萧条期。北魏前期, 为了扩张生存空间, 巩固新生政权, 军事斗争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内容。在此形势要求下, 文学丧失了独立于政治、军事之外发展的可能, 文学专门服务于军事, 成了军事的喉舌。文章与文学混同, 文章掩盖了文学, 而所谓的文章纯粹就是军国文翰, 沈浊铢钝, 重实轻质。时为著作郎的宗钦有诗《赠高允》: 巍峨恒兮, 混漾沧溟。山挺其和, 水耀其精。时与崔浩撰修国史的高允, 在其诗《答宗钦》中写: “汤汤流汉, 蔼蔼南都。载称多士, 载耀灵珠。”两首诗虽为当时文学精英所作, 但手法拙直, 质木无文, 可以视作当时文学凋敝的缩影。这点还可以从高允《鹿苑赋》中体现到, “庶真容之仿佛, 耀金晖之焕炳; 即灵崖以构宇, 竦百寻而直正; 縹飞梁于浮柱, 列荷华与绮井”, 继承了汉大赋的铺张扬厉, 暗含微丝的劝谏之意, 但是, 艺术上并无可鉴之处。在公元400年北魏颁布的《天命诏》和公元478年颁布的《明功罪诏》中可以深切感受到风格洗练, 偏文废质, 虽为帝王诏诰, 却全无帝王之气。

在这样的外部大环境下, 文学作品沦为御用政治宣传品, 传统文学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的“大道”消解殆尽, 文人丧失了文化操守, 至此“文学在政治的驱赶下, 已经退缩到最微不足道

的角落里, 只剩下文字这个空架子在那里支撑着, 文章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文学性已经极少在文章中显露, 只有政治上胜利声势在支撑, 文章成了华美文字的拼凑”^[1], 歌功颂德的庙堂作品多之弥多, 吟咏性情的纯粹文学鲜之又鲜。

总之, 从前代遗留至今的文献资料考察, 北魏前期“文章殄灭”, “文章道尽”, 鲜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探究北魏前期文坛凋敝萧条的原因, 当在于以下诸方面。

1 武治文明对文学的削弱

《魏书·高祖纪》载: “有魏始基代朔, 廓平南夏, 辟攘经世, 咸以威武为业, 文教之事, 未所遑也。”^[2]北朝为乱世, 社会动荡, 兵燹连年, 野无青草, 室如县罄。北魏自道光武帝拓跋珪建国, 经明元帝拓跋嗣, 到太武帝拓跋焘, 崇尚武治文明。即便在平定统一中原后, 也特别强调军事的胜利。突出表现为, 北魏统治者针对外族频频发动具有强烈掠夺色彩的攻伐征战。在历次北魏发动的战争中, 都有掠夺牲畜、财物和人口的记录。始光三年(公元426年), 拓跋焘率军进攻统万(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 因其城防坚固, 未克, 遂掠牛马十万头多, 徙其民万余而还家。始光四年, 拓跋焘再次讨夏, 攻占统万, 掠获牲畜珍宝无数。神䴥二年(公元428年), 拓跋焘亲自率军北伐蠕蠕, 获

收稿日期: 2014-12-17

作者简介: 任江维(1979—), 男, 陕西淳化人, 文学硕士,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 文艺批评、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牲畜人口数以百万计。为了维护其军事统治,保持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遍设军镇,推行胡人从军、汉人耕田,以骠悍犷野、骁勇善射的拓跋部族为主,组建庞大的军队,戍边御外,镇压征讨。治国政策的偏执,治国精力和重心完全侧重于军事,导致其经济、文化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仍保留了浓郁的奴隶制形式和游牧文明色彩,典章残缺,文教荡然,“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无暇顾及文学事业的发展,终致文学荒芜凋敝。

2 严酷险恶的政治环境使然

“严酷险恶的政治环境,典型事例即‘崔浩国史案’,北朝前期著名的文人几乎全被杀完,由此造成视真正的文化创造为畏途的现象。”^[3]在实现“平暴除乱,扫清不顺”军事上的空前胜利之后,北魏“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深感统治乏术的北魏政权为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拓跋焘在神䴥四年和延和元年两次下诏,表达了其“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搜扬隐逸,进举贤俊”,吸纳汉族士人中的优秀分子参与执政兴国的希冀。其时,举国之“贤俊之胄”,皆被“随才文武,任之政事”。神䴥四年诏云:“‘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数者百人,皆差次叙用。”^[4]据统计,拓跋焘统治时期,汉人为刺史的比重从道武、明元二朝占总数的7.3%上升到40%^[5]。但是,政治上,拓跋氏在利用汉族士人的经世致用之才余,深层次却充斥着浓烈的猜忌和深重的隔阂,这些浓烈的猜忌和隔阂“扰乱事务,使之不能顺利有恒。使为君者易行虐政”^[6],并由之引发了血腥事件。

如《魏书》所记:“魏氏之有天下,百余年中,任刑为治,蹉跌之间,便至夷灭。”^[7]公元450年6月的平城“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北魏拓跋氏在此实行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才艺通博,究览天人”的北魏士族领军人物崔浩罹难,与此同时,“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8]邓渊,“性贞

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明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谨于朝事,未尝忤旨”^[9]。但因其从弟邓晖与定陵侯案有牵连,道武帝怀疑邓渊知情不报,于是赐死刑,邓渊无辜而死。世祖尤为器中,以为上客的段晖,也因被他人告发置金于马鞞中,而欲南奔。世祖不问情由将邓晖“斩之于市,曝尸数日”。在北魏政权的铁血遏制下,面对生命的无常,汉族士人表现出了相当的谨慎小心,唯唯否否,宛若惊弓之鸟,或韬晦,或沉湎,或将心血之作付之一炬,或藏匿不示。崔浩的父亲崔玄伯“作诗自伤,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张湛经历崔浩被戮之后,将其文稿“悉烧之”。或莫谈文学,趋避之。高允“不为文二十年矣”。汉族士人将昔日的本业,自身生命的组分——文学,弃之如草芥,避之如瘟疫,可悲可怜,盖“时运使然也”。

除了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残酷绞杀外,北魏政权还发动了针对佛教的一次血腥涂炭,成为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的始作俑者。北魏政权认为沙门“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万天下”,拓跋焘下诏“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10],在皇权的号召下,“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佛教经历了前期北魏诸帝的认同扶持后,在拓跋焘时代谐和局面终被打破,佛教惨遭几近灭亡的舛运。且不论崔浩类死出或因华夷,或因释老,客观上,以“国史门”事件为代表的北魏政权这种针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动辄得咎式的血腥高压,对文学文化的疯狂洗劫,其根源在于士族文人实现政治主张与鲜卑贵族现实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日趋尖锐而导致的,“两种文化代表者政治势力上的悬殊,决定了这种文化对垒的最终结局”^[11],鲜卑武人以强硬的高压手段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暂时胜利。鲜卑武人的高压铁腕,无情屠戮,政治环境的险恶导致了汉族士人对文学创作的强烈恐惧心理,如履薄冰,诚惶诚恐,文人的独立个性消解殆尽,几乎全部蜕变为北魏拓跋贵族的工具。

3 鲜卑化对抗汉文化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原因是表层的外因,那么导致北魏前期文学创作凋敝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从文化形态上解释,则还是拓跋鲜卑对汉族士人汉化势力的反动”^[12]。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知,鲜卑拓跋部落游牧耕作(shifting cultivation)历史渊源已久,从占据大兴安岭到与六国瓜分前秦版图,至建都平城,北魏所得的仅是偏北方一隅,其余富庶膏腴皆为他国所得,因此在对汉文化遗产的承继上也相对缺位,仍游离于汉文化之外。迄至五胡乱华,拓跋氏即使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土地,即使与汉文化有了相对近距离的碰触,但这种碰触仍是窥探观望为主。实质上,对汉文化依然报之以排斥、猜忌、提防、怀疑,甚至妄图将汉文化鲜卑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谋求推行鲜卑化的模式和道路。就如吕振羽表述:“拓跋魏在南下前,本身确才进入奴隶制;但在其南下后,它企图以奴隶制加于封建制发展到了高度的汉族地区,因而便形成了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13]

如前文所述,北魏政权出于治国乏术的情由,任用了相当量的汉族士人,诸如卫操、莫含、邓渊、许谦、燕凤、崔玄伯、高允、游雅等北魏社会的文化精英分子,任用他们的工作无非是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造浑仪、考天象尔类,粉饰太平,或为文字增色。这些人的文学才能、文治才能很高,但是从他们创作的作品来看,多是御用颂德,这些原本意义上的文人学士沦落为北魏政权的代言人、御用文人,毫无个性可言,个人修养、人格层次、文化操守全面沦陷。这些可以从高允《代都赋》、游雅《太华殿赋》、高闾《宣命赋》、程骏《庆国颂》等时文中窥知一斑,几无观瞻价值。他们在创作中,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的雷池也就是鲜卑贵族的统治意图,创作中不允许有率性的发挥。张褒就曾因与崔逞起草答司马德宗将郗恢的文章,有违皇帝意图,因之被贬为尚书令史,即便他为北魏王朝殚精竭虑,亦难逃贬谪。崔逞因言“飞鸢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可取以助粮”,触怒了拓跋焘,“衔其侮慢”,终被借口杀死。崔浩纵为拓跋政权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但却也仍未逃离卸磨杀驴的厄

运,以“国史门”为借口被戕。恰如宋代叶适在《习学纪言》中所云:“刘、石、苻、姚与夫慕容,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

“国史门”事件的发生,表明了在北魏社会,鲜卑武人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士族的汉化力量。这种深厚的本民族文化情结,鲜卑化汉文化直接导致了文坛单调寥落。

在以上诸内外因素消极合力作用下,北魏文坛举目四望一派萧瑟,文坛处处充盈着厚重浓郁的官方色彩、政治色彩,现实功利取代了审美功用,工具价值消解了文学本体,原本不发达的北魏文学就愈发地单薄、凋敝、萧条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儒生不幸文坛幸,有的文人亦不甘世运不济,以文章传达自己的心声感悟,藉文学悲叹个人身世之感,饱蘸着性情。文学在凋敝寥落中也泛起了涟漪波澜,虽然成就不大,时间不长,貌似漆黑孤寂的长空划过一线惹眼的流光。如刘昶《赠中尉李彪诗》,胡叟《示程伯达诗》类似诗歌皆哀婉悲怆,于情于境有成功之处。更有郦道元《水经注》,作为我国完整的地理学专著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对神州山水的镌画非南朝文学可以匹敌,成为北魏前期以及北魏,乃至整个北朝文学的巅峰之作。民歌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文学形式,承袭了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质朴刚健,在北魏前期的文坛荒漠年代,成就分外耀眼。《敕勒歌》可视为敕勒民族悲壮历史的记录。《木兰诗》表现了对拓跋民族精神的赞美。《诘汾力微谚》是对拓跋先祖的追思。《时人为李崇元融语》反映了吏治的腐败,《时人为上高里歌》则是表现了下层民众的悲苦心声。

参考文献

- [1]周建江.北朝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3.
- [2]魏收.魏书:卷七(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7.
- [3]吴先宁.北朝文学研究[J].文学遗产,1993(1).
- [4]魏收.魏书:卷四(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79.
- [5]何德章.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0,17.

(下转第64页)